

窗间一经书生辈 亦开风气亦为师

——忆萧前老师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反映论，不是如有人所理解的照镜子式的机械反映论。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论述，需要我们深化研究，给以丰富和发展。”

□ 周文彰

1984年2月3日晚，我和萧前教授并肩漫步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没有雾霾，只有我俩吐出的淡淡青烟。

我们出了校门，走向附中，又从附中，返回校园，如此反复，惬意长谈。两包香烟，对抽个精光。连续三天的博士生招生考试下午刚刚结束，累得半死的我去向萧前道别。萧前说：“出去走走罢！”他已经有意录取我了。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仰望已久的老师在一起。这一年，我31岁，萧前60岁，他还不到我今天的年龄。

“祖师爷”

在初见萧前之前，用“如雷贯耳”来形容他的名气，恰如其分。

当我作为“七七级”跨入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用的教材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由艾思奇主编，萧前是主要执笔人之一。哲学系副主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原作者胡福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主讲老师李华钰等，都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都是萧前的学生。

萧前，用陈先达教授的话说，是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祖师爷”。

萧前，1924年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读中学时就喜欢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1946年年底，他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吴晗的推荐下进入解放区，到北方大学文学院学习，1947年春节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哲学家艾思奇，成为艾思奇的行政和学术秘书，进入哲学领域。1948年北方大学合并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950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萧前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在此，一直工作到2007年去世。

1951年，费·让·凯列等苏联专家来人民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教师作翻译和理论辅导，萧前担任理论辅导组组长，兼凯列的助手，开始了和凯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哲学交往。萧前曾经说过，他

的一生得益于两个好老师，一是艾思奇，一是凯列。

1952年7月，根据中央宣传部的要求，人民大学举办马列主义研究班，设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共党史四个班，为全国高等学校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萧前任哲学研究班班主任。研究班连续招收多年，培养了大量人才。黄楠森、高青海、李秀林、陈先达、汪永祥、庄福龄、杨宪邦等一大批哲学家，都是研究班的学生。杨春贵、胡福明、刘放桐等哲学家也都是萧前任教的研究生班的学生。马俊峰教授说得十分贴切：萧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地位，是在研究班时期奠定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

我们“七七级”进入大学的那个时候，即1978年3月，真是“百废待兴”。“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不久，教学秩序尚处在恢复和重建阶段。没有像样的教科书，是师生面临的最大问题。各学科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夜以继日地编写讲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是幸运的。我们不但有老师们刚刚辛辛苦苦编发的厚厚讲义，还有艾思奇主编、萧前参与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全部哲学著作、论文、演讲、通信等等构成的，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内容和内在的理论体系。如何引导和便利人们学习和领会呢？就需要对经典著作进行提炼、梳理、解释、应用，形成教科书。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编写一本反映中国实际、体现时代要求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艾思奇和萧前等13位教师身上。

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全国高校通用，干部教育培训也用，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和宣传，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们公认萧前在其中



的重要作用 and 贡献。艾思奇同志去世后，萧前和其他专家一道，又根据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对“艾本”进行了修订。

普遍适用性，既是这本书的长处，也是它的不足。作为哲学专业的教科书，显然应当更加厚重，即理论的深度、广度、论述、分量等等，都需要加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认识需要深化；被“十年动乱”搞乱了的哲学原理和哲学概念，亟待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已经开启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体现、去贴近。

编写专业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受教育部委托，由萧前、李秀林、汪永祥担任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别在1981年和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两本书都标着“哲学专业试用教材”。1990年萧前和汪永祥老师主持了这两部教材的修订工作。《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两书获得广泛赞誉，迅速成为全国各高校哲学专业通用教材。这两本书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与时俱进的思想家

一直萦绕在萧前心头的问题是——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不是准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创立的哲学理论及其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何概括和提炼当代社会实践、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而得到丰富和完

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怎样完善和丰富才能对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应有的指导？等等。

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贯穿萧前老师后半生的哲学生涯。

我博士生入学考试结束时那个晚上，萧前和我在人民大学校园里的长谈，大部分内容是集中在这些话题上。他特别重视和鼓励我对西方哲学史和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趣和了解，他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需要借鉴和吸收这些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其他哲学不应当有派主义情绪”。

1980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1983年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等论文，阐发了他对如何梳理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思考，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我 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以及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对我国哲学发展的负面影响的反思。

此后几年，萧前连续发表文章、参加研讨，阐发他的新观点。例如，1988年在“实践唯物主义研讨会”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坚持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突破多年来几乎被我们视为当然的现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和体系，建构和创造反映当代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内容和新体系，已成为紧迫任务。”萧前把反思的矛头直指自己所主编的教科书。

我当时在场，这番话让我充满敬意。毕竟，教科书的影响太深了，要

形成新的认识上的一致是很难的。所以，正如萧前指导的第一个哲学博士李德顺所说，我国哲学界曾一度出现别人比萧前更坚持“萧本”教科书体系的现象。

1985年，在萧前的倡议和主持下，以全国当时8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教授组成课题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和哲学原理教材改革”。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就是199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这本书从内容到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富有成就的探索，黄楠森称之为“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创新活动”。

萧前的思考直接付诸行动了。1981年，萧前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1982年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成立，萧老师被推选为执行会长之一。

活跃的“师生理论创新群”

一个在思想上与时俱进的导师，自然要求和鼓励他的博士生们以创新作为哲学研究的灵魂。萧前常说：“不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1985—198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就是萧前和夏甄甄两位教授。夏甄甄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卓著成果独树一帜。两位导师，志同道合，如同一人，博士生专业方向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共同愿望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成为我国“时代精神的精华”。导师身先士卒，学生奋力拼搏，论文、演讲、访谈频繁见诸报刊和研讨会，渐渐形成了一个“师生理论创新群”。而主体性问题似乎又是我们前后三届同学的共同课题，李德顺的价值论、郭湛的主体活动论、陈志良的思维建构论、欧阳康的社会认识论，以及我其后完成的主体认识图式论，都贯彻着对主体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反映论，不是如有人所理解的照镜子式的机械反映论”，针对当时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诘难，萧前对我说，“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论述，需要我们深化研究，给以丰富和发展”。

我心领神会。不久，我拿着博士

论文《主体认识图式研究》写作提纲去见他，他看了并听了我的汇报，当即点头同意，并嘱咐我好好关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科学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我照办了。在论文的开题、写作和定稿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萧前老师悉心指导的巨大作用，特别是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实事求是所产生的重要力量。

活着就要思考

正值萧前持续发力，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发展时，1996年10月，他病了，而且一病就不轻——脑溢血，开颅手术又不及时，他的体力和智力受到病魔的严重摧残。

醒来之后，他发现，左手左脚不听指挥了。我从海口来北京人民医院看他，他指指身体左侧，口齿不清地说：“谁让我反左的呢！”一句话说得我们忍不住笑起来。乐观、豁达、顽强，这就是在病魔面前的萧前。他对面来看望的人说：我现在是“两手抓”：一手抓体能锻炼，一手抓脑力恢复。

他真的慢慢恢复了，得益于现代医学，得益于他的毅力，特别是得益于他贤惠无怨而又是医生的妻子潘瑰智。

他为自己能够整段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而兴奋不已，为自己能够亲眼看到香港回归而兴奋不已，为自己能够跨入新千年而兴奋不已。2004年5月9日，人民大学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理论研讨会暨萧前教授80华诞纪念会”，并出版了《萧前文集》，李瑞环同志题写了书名。

活着就要思考。他每天都在关注天下新闻、国家大事、哲学动态。领导同事老友学生们来看望他，话题常常自然地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哲学思考等话题上。我从海南来京，每次看他都是这样。

学界似乎也没有把萧前当成留有中风后遗症的病人，他的威望、他的思想，冲淡了人们这方面的意识，经常邀请他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当然，他已经不可能有求必应了，只能择而为之。有一次，当我推着轮椅送萧前老师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表达敬意，表示欢迎。

2007年8月23日凌晨，萧前思考了一生的大脑永远地停止了思考，享年83岁。

人们这样评价萧前：“半个世纪以来，萧前教授始终站在哲学基本理论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前沿，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体系的创立人和学科奠基人之一，成为我国当代最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学术人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孙要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伟大的实践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背后的哲学支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建构一种在形态上既独立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学术使命。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进展，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由“定于一尊”到“百花齐放”。改革开放前，受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比较单一。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自觉摆脱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开始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精神、实践、主体、个体、自由等元素。由此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多重理解，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人学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由“原理注脚”到“客观记述”。作为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和“哲学史梳理”可谓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有了哲学史作支撑，原理才有历史丰满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不是一下子就走向成熟的。改革开放后最初几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写作体例、方法、指导思想

依然受制于传统的哲学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简单看作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史。结果，这种哲学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这种哲学观的“历史注脚”“历史验证”。此后的几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写作，开始逐渐自觉地客观描述历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翻译评介”到“比较对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种现代西方思潮。70年代末，它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对象。80年代，学界掀起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概念、人物、问题、内容、对象、特征、地位的讨论。国内学界关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近年来诸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成为学界的新热点。9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不加分析地盲目引入移植，跟在它们后面人云亦云，或者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离经叛道”，简单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予以批判然后置之一旁，谈不上深入研究和仔细甄别，甚至还存在很多误解。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开始理性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基 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面对的具体社

会问题的一种理论回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研究由“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研究问题时文本意识缺失，在阐发马克思的思想时“实用主义”倾向比较明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的书写，抑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展对话，都需要从真实的、原本的马克思出发寻求文本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原点”作为支撑。只有从文本出发才可以真实诠释马克思。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开始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尤其马克思本人文本研究的热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上述巨大成就，但是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在以下几点重点着力。

研究方法要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孤立地分开而是糅合在一起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也是理解和进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不同维度，它们只是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视角、方法，每个视角都需要另外两个视角的互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要注重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和书信这个庞大的“文本群”的研究，马克思理论生涯中多数是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可见其关注重点所在。其哲学不是孤立的哲学论文或者专著，而更多

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过去，国内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往往只是注重其早期几本哲学著作和晚期的一些书信，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对《资本论》文本群这个巨大的理论宝库挖掘不够。还有一些学者只研究青年马克思而忽视中年马克思，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只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

研究对象要更加注重面向“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少存在着学院化、形式化、概念化、西洋化等特征，片面追求学术上的形式化，对社会发展中现实突出问题缺乏热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来源于现实，往往是在概念、命题、文献的世界中兜圈子，用所谓的西方学术标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行“学术包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看起来与西方学术话语没有区别。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的割裂。马克思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关注范围十分庞博：经济发展、农业问题、世界历史、国际贸易、政治国家、国际关系、军事、自然科学、文学戏剧等，他十分善于

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哲学概括。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少要关注“马克思曾经关注过的世界”，而不是关注“马克思关注世界的曾经文本”。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大有所为，对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力量、中国价值进行哲学上的概括、总结、提炼，为下一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提供智慧支撑、哲学滋养。

形态创新要更加注重推进“中国化”“民族化”。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体现着特定的民族性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在于“改变世界”。要在中国完成这种历史使命，它必须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才可以引领群众。如果没有这种结合，它就不可能对人们精神世界进而对现实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要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也要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现实的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吸收借鉴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提升、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术综述